

#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国辉： 迟轲先生为我们提供了 理解西方艺术的深层坐标系

作为新中国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，迟轲先生正是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，以及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论学科的重要奠基人。2003年前后笔者作为本科生参与协助迟先生编撰《广美名师列传》时，曾采访过他，亲聆其关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见解与阐释。今逢清明，缅怀先辈，寄以追念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属迟轲先生的学术活跃期。迟先生敏锐地意识到，对西方艺术的引介，不能停留在表面的风格模仿与概念搬运，而必须深入到其历史脉络、社会根源与哲学基础之中。因此，他将主要学术精力投向“组织译介有关西方美术史的基础理论著作”这一“基础工程”，视其为沟通中西的“桥梁”。迟先生翻译的L·文杜里《西方艺术批评史》，主持编译的《西方美术理论文选》《西方美术事典》《罗丹笔记》等，以及其个人撰写的扛鼎之作《西方美术史话》，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直接体现。《西方美术史话》自1983年初版后，累计发行逾30万册，影响数代学人，成为西方艺术启蒙的经典读物。迟先生坦言，致力于基础理论的译介与普及，是“对近10年文艺思潮的解放与形形色色的

西方现代主义对我国青年的影响进行反思的结果”，他希望通过扎实的史论梳理，为中国艺术界提供理解西方艺术的深层坐标系，避免在“热潮”中陷入盲目与迷失。

面对当时几乎成为“热点”乃至某种“时尚”的西方现代主义，迟轲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与批判性距离。首先，他明确指出现代主义不应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。其次，他将当时中国青年对现代主义的接受，与特定的社会心态联系起来。他提出理解西方现代主义，并非等于认同，更不等于在艺术上倡导与之相应的价值取向。他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界限：艺术可以反映时代的困惑与痛苦，但艺术家不应放弃自身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建设性责任。

迟先生并未停留于理论推演，而是广泛征引其在国际交流中的亲身见闻作为佐证，展现其开阔的视野。他曾提到英国作家艾瑞斯·莫尔多克对西方当代文学“个人自我中心主义”内核的批评，以及他对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大师们那种“对社会、人类充满信心”的批判精神的推崇。迟轲先生对当时国内艺坛一些盲目模仿，甚

至哗众取宠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，认为这是“没有很好地了解西方，也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”的表现，会造成“混乱”并产生“不好的社会影响”。

当然，迟轲先生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也并非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。他客观地指出，现代主义在形式探索、色彩创新等方面，“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”，认为其对于装饰艺术、工艺美术等领域具有启发价值，其中对“梦的意境”等潜意识领域的表现手法亦可供借鉴。这种既有批判性的“人文之眼”，又有选择性地接纳的态度，恰恰体现了一位成熟学者所具有的理性深度与学术包容性。同时，此种建设性的学术姿态，对于启迪今天学术与创作生态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。

■《广州美院名师列传》迟轲 陈儒斌编 花城出版社，2003



## 延伸

### 迟轲

迟轲(1925—2012,别名“迟雁鸣”),著名美术史论家,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,历任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、美术学系主任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,2004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“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”称号。

## 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陈年发： 回忆江文湛先生

江文湛先生，乃当代画坛之巨擘。先生人品端方，艺品卓绝，一身风骨凛然。那一头如覆白雪的银发，更衬得斯文儒雅，步履轻盈宛若仙家。

谁承想，3月12日洛阳之行，竟成永诀。噩耗传来，泪湿眼眶，竟至彻夜无眠。辗转反侧间，先生与业师永锵先生的

过往交集，一幕幕清晰如昨，涌上心头。

初识先生，是在北京随师参加国家画院成立三十周年大庆。彼时二师相见，竟如稚子般相拥，静默片时，无半分俗套寒暄。于肢体相触间，以心传心，满是知己相契的珍重。

及至机场送别，更见真情。当日，先

生飞返西安，永锵师归广州，二人相拥良久，似在暗付再会之期。未料先生拉着永锵师之手，径直走向候机楼旁的小茶馆。落座，忽有一人捧来一公升洋酒，我暗自心惊，这般酒量，何时能尽？待助手提醒登机在即，我更是心急如焚。

谁知先生却对助手朗言：“喝完这瓶，再登下一班。”言罢，与永锵师对饮，神态悠然，恍若东西二仙闲话人间。这机场一隅，竟成了画坛最亮丽的风景。酒尽樽空，先生登西安航班，步履从容，临行回首，宛若仙客远去。永锵师亦伫立目送，待身影消失，才奔赴广州登机口。

我因目送先生，误了原班机，只得改签。补差价时，工作人员告知有头等舱位，需补两千余元。我未半分犹豫，当即买下——非为惜金，实因永锵师平生倡导众生平等，从不攀附高位。我若委屈自己，便是违了师者风骨，亦失了对先生的敬意。

此后随师两赴西安，皆访先生的“红草园”。园居终南山麓，两山对峙的山涧开阔处，进门即见飞瀑流泉，松风轻吟。循溪而上，屋舍错落，老树亭榭点缀其间，宛若世外桃源。园因遍植红草，故名“红草园”，恰如先生心境，素朴而热烈。

一日，先生与永锵师行于园中路，隔路相语。先生朗声而言：“永锵，某日你携画来西安办展，场馆、时间我皆已定，只管作画，其余不必挂心。”永锵师追问展线细节，先生只答：“我不管细务，你只管带画来便好。”果不其然，锵师如约办展，无声中藏深意，收获满堂喝彩。这正是二师之交的写照：大处着眼，全然信任，平淡中见深厚。

永锵师崇拜东坡先生，平生以其为

处世楷模。永锵师六十六岁时，举办“晴秋·澄秋”大展，江先生闻讯亲往道贺。我问起食宿安排，他却笑言：“不必管我，你只照顾好锵弟便好。”寥寥一语，道尽体恤。那场雅集，宾主尽欢，酣畅淋漓。

后一日，先生同游“板桥草堂”，又访“稼轩”。先生好琴，永锵师赠琴，先生坚辞不受，遂有送琴之举。席间开怀畅饮，颇有唐代“饮中八仙”之趣，道尽知己相契的洒脱。

先生与永锵师之交，道至简，情至深。正如古语所云：“相见亦无事，别后常忆君。”无过多客套，却藏无数珍重；无刻意维系，却历久弥坚。画坛轶事、闲谈碎语，皆成佳话；而那份君子之交的纯粹，更显珍贵。

江文湛先生，就此仙逝。他带走了画中独有的天趣与灵动，更带走了画坛稀缺的君子风骨。斯人已逝，风骨长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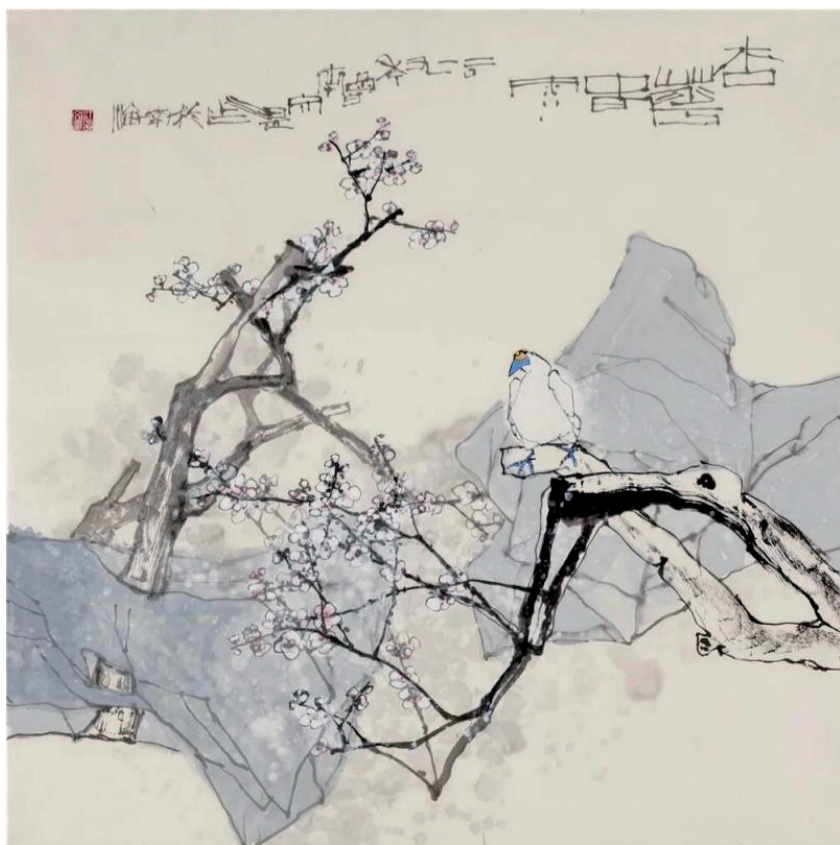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落笔，最想说的，仍是那句“平淡见风骨”。先生一生，于画是天真烂漫，于人是坦荡君子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在一杯茶、一瓶酒、一场展、一张琴里，立住了一个大写的“人”。

愿先生一路走好，其艺其德，当与山河同在，长留人间。

## 延伸

### 江文湛

江文湛(1938—2026),一级美术师、有突出贡献专家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西安中国画院原副院长、西安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。



■江文湛《杏花春雨》